

庞思纯 著

人者、不以藉體而賓、而籍之、所達也、以目測其知  
才者、不以加而怪斯、一失、而舉之、愛才者、  
**明清贵州  
700  
进士**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明清贵州七百进士

庞思纯 著

明清贵州七百进士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清贵州七百进士 / 庞思纯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5.4

ISBN 7-221-06902-6

I. 明… II. 庞… III. 进士—贵州省—明清时代  
—人名录 IV. K82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1398 号

## 明清贵州七百进士

---

作    者	庞思纯
责任编辑	王长春
策    划	吴晓霞
装帧设计	徐学廉
插    图	徐学廉
出版发行	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2)
印    刷	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版    次	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    本	787 × 960 1/20
印    张	14 印张
印    数	0001—5000
书    号	ISBN 7-221-06902-6/K · 874
定    价	36.00 元

## 序一

史维忠

几年前，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陈福桐先生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六千举人、七百进士》。他的用意很明确，就是告诉人们，贵州自建省以来，人才辈出。这是一篇实实在在的文章，没有虚假，也没有水分，字字都有来历，是根据《明清进士题名录》归纳出来的。贵阳五中的中年教师庞思纯是个勤奋好学的人，他在陈老先生的启发下，孜孜以求，查遍了贵州的地方志，把七百进士的姓名、籍贯、科甲整理出来。作家李宽定也是个热心肠，他将庞思纯所录的《贵州进士名录》镌刻在海天园的石碑上，使之流芳千古，以昭后世。

庞思纯有浓烈而深厚的“贵州情结”，他热爱山明水秀的贵州，更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“大山之子”。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，废寝忘食，潜心搜索，用了不知多少日日夜夜，写成了近三十万言的《明清贵州七百进士》。这部书，不但扩充了《贵州七百进士名录》，而且写出了“大山之子”的品性、风采和节操。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，山水给予人智慧和灵性，山水孕育出宽厚、仁慈、刚毅、坚韧而有棱角的贵州人。他们走出大山，登上全国的大舞台，做出了许多可钦可佩、可歌可颂的事迹，值得我们景仰。

在“科举制度”下，“进士”不但是一种荣誉称号，而且是当时的最高学位。“禹门三级浪，平地一声雷”，不经过三番五次的考试，要想“金榜题名”是办不到的。明清的科举考试，有童试、乡试、会试三级，童试被录取的称为“秀才”，经过全省“乡试”选中的称为“举人”，中举后方可参加全国“会试”。会试又有“礼部试”和“殿试”两关。礼部试由礼部尚书主持，从数千举人中选出数百名成绩优异的“贡士”，然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“殿试”，经过考核，确定科甲品级。科甲有三等：第一甲三名，赐“进士及第”，名列榜首的称“状元”，第二名为“榜眼”，第三名为“探花”；第二甲若干名，赐“进士出身”；第三甲若干名，赐“同进士出身”。由此可见，中进士的绝非等闲之辈，他们经过“十年寒窗”，才成为全国考试的优胜者。

明以前贵州教育不兴，偶尔有几人到外地参加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。明代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，朝廷确定“治国以教化为先，教化以学校为

本”的方针，于是黔中官学、书院、社学、私塾纷纷出现。经过明清两代500多年的时间，贵州人才联袂而起，“六千举人、七百进士”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人才之兴，在于教育。教育发展起来，人才便会不断涌现。尽管贵州的学校教育比中原晚了千年之久，可是自明代教育兴起后，人才便层出不穷，“六千举人”是人才发展的一个阶梯，而“七百进士”则进入了人才的高级层次。到了清代，还出现了“三鼎甲一探花”，有武状元曹维城，文状元赵以炯和夏同龢，以及中了探花的杨兆麟。

科举制度有其局限，也存在若干弊端，但历史地进行考查，应当看见它的积极作用。“开科取士”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，从隋初到清末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。科举制度的功绩，在于否定了世族及子孙的“世卿世禄”制度和囿于门第的“九品中正”制度，它排斥了以长官意志为主的“察举征辟制”，而以“考试”为归，从三个方面体现出它的优越性。首先，它把考试放在第一位，按统一标准进行考核，然后“以试取人”，使选人有一个确定的尺度，减少主观的随意性，而且，可以不断激励人们去奋发努力，把人才吸引到国家需要的方向。其次，它把知识作为考核的内容，提倡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，有利于造成勤奋好学的社会风气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体现了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精神。其三，它把“选”和“举”结合起来，通过公开招考，网罗一大批人才，为布衣、寒士打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，使朝廷在选官上有了更大的空间，不致囿于当权者经常接触的小圈子。科举制度虽然已经废除，但它的合理部分为西方文官制度吸收，对当今我国公务员的考核仍有借鉴意义。

庞思纯的《明清贵州七百进士》，有许多理性的思索。它以雄辩的事实，破除了“贵州无人”的历史偏见，让人们努力去发现贵州人才。它告诉人们，人才要从教育抓起，振兴贵州必须重视人才，把教育放在首位。西部大开发，贵州怎么办？贵州人的心情格外急迫，希望在这新一轮的竞赛中，使贵州能挪动一下在全国排行榜上的位置，实现兴黔富民的美好愿望。当今世界，在知识经济大行其道之时，资源的优势已经下降到第二位，而人才的优势凸显出来。贵州能不能迎头赶上，关键在于人才，在于人才的培养，在于“人尽其才”，在于重视贵州人才。《明清贵州七百进士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，它可激励人们努力奋发，它可重新树立贵州形象，它可供领导者作为“资治”之用，值得认真阅读。

## 序二

李承久（台湾）

我们贵州在明清两代出了七百多位文进士（武进士未计），这个成绩，以当时全国十八行省来说，应该算是中上，值得吾人引以为荣，足以自豪。这无形中起到了继往开来、承先启后、见贤思齐的作用。

科举时代，帝王统治国家，少不了需要派任许多优秀的公务员到各级政府工作，如何选用如此众多的人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开科取士。因为士为四民之本，社会地位相对提高，相沿成风，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观念，就是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、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、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能金榜题名，扬名显亲，这是士子们最向往的一件美事。

千百年来，科举考试还算公平，深得社会大众信赖，士人如想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，事实上也非做官不可。中了进士，得了功名，有了资格，仕途也比较顺利，难怪读书人趋之若鹜。

贵州僻处西南，土著民族原是所谓的少数民族，中原汉族文化自古就逐渐向西南传播，汉人随即迁入，尤其是从所谓“调北填南”开始，移民实边，改土归流，贵州人民汉化加深，承袭良好的读书风气，尊师重道，文风日盛，参加科举考试的土人越来越多，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七百多位进士。

偏僻且闭塞的贵州，当时交通不便，读书人多半清寒，进京赶考，谈何容易！不说别的，第一要有财力（旅费），第二要有体力（健康），第三要有毅力（恒心），第四要有学力（真才），第五要有神力（好运），五者缺一不可。不是人人一考就中，淘汰率很高，能中进士的人真是千挑万选，确为优秀人才，并非浪得虚名。所谓人杰地灵，互为因果，也有几分道理。曾国藩就说过：“豪英不地囿，十九兴偏邦。”

可以说：吾黔这七百多位进士，都是国家的栋梁、民族的菁英、社会的中坚、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导师、文化历史的传承者和创造者、时代的主流和幸运儿、群众的宠儿、天之骄子、国运的舵手、民命的屏障，当然都是国士——济国之士、士子楷模。

在这七百多位进士当中，尽管各人的际遇悬殊，成就不同，功绩

各异，但都值得特别表彰，因为“莫为之前，虽美而弗彰；莫为之后，虽盛而弗传”。基于此一信念和理念，庞思纯先生正值盛年，欣逢盛世，公余之暇，立志于此，近年先后撰成《明清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》和《明清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名录》两篇长文，先后在台湾《黔人》杂志发表，博得省内外乃至国内外文化历史教育界专家学者的推崇，认为是吾黔石破天惊、史无前例、考据纂详的一块新里程碑。今年他更进一步加以补充，写成《明清贵州七百进士》一书问世，功德圆满，等于是为这七百多位进士竖立了一块巍然整合、屹立不摇的丰碑，他们在天之灵也会心存感激，引为知己，且其后代子孙必定更加感佩，每饭不忘。我们中国传统读书人最大的乐趣就是著书立说，思纯先生得之矣！

思纯先生有此成就，为吾黔文史做出此一重大贡献，这与著名学者遵义陈福桐老先生的启发鼓励不无关系。所以说，此书之成，陈老功莫大焉！

思纯先生是个有心人，神交古人，曾经为这七百多位进士中的一部分人撰过传记，这就更为难能可贵。可以想见他为了写这本书，在教学之余，不知投入多少心血、精神、时间和智能，翻阅多少典籍，相互参证。这是一种纯尽义务、业余玩票的伟大工程，文史工作的朋友们必定对此有深切的体会。

思纯先生择善固执，身体力行，是吾黔学者的表率。他这部书是传世之作，固然必定嘉惠士林，他自己因此必将更加蜚声士林。功不唐捐，此之谓也。当兹《明清贵州七百进士》付梓前夕，草此芜文聊表推崇之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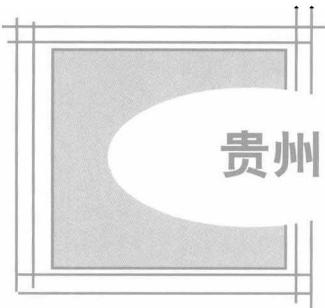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四年九月九日于台湾《黔人》杂志社

## 目 录

序一	史继忠
序二	李永久（台湾）
明清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	（ 1 ）
劲节清风话黄缓	（ 13 ）
申祐与土木堡之变	（ 18 ）
骨鲠之臣徐节	（ 22 ）
黄平人文与周瑛、王耘	（ 25 ）
疏请贵州乡试开科的田秋	（ 30 ）
名臣大儒孙应鳌	（ 34 ）
徐穆与徐如澍	（ 39 ）
安边恤民的蒋宗鲁	（ 43 ）
才华纵横的丘氏兄弟	（ 46 ）
陈尚象与邹元标	（ 51 ）
两代风流 -- 杨师孔、杨龙友父子	（ 56 ）
周渔璜与桐野书屋	（ 62 ）
康熙武状元曹维城	（ 66 ）
清廉恤民，天地可鉴（王士俊其人其事）	（ 69 ）
一个世代不衰的文化世家	（ 75 ）
周奎、周际华父子	（ 80 ）
洪亮吉与傅潢父子	（ 85 ）
乾隆年间教育家艾茂	（ 91 ）
乾嘉学派的贵州传人莫与俦	（ 94 ）
刚正不阿徐御史	（ 99 ）
沙滩文化的奠基人黎恂	（ 102 ）
清镇三名贤	（ 108 ）
毕节豪英邱煌	（ 114 ）
一代良吏李朝仪	（ 117 ）
“殿上虎”花杰	（ 122 ）
扬州抗英的但明伦	（ 126 ）

黄辅辰、黄彭年父子	( 131 )
胡长新与莫友芝、郑珍的师生缘	( 137 )
近代史上的悲剧人物陶廷杰	( 142 )
丁宝桢的为官之道	( 147 )
民族精英石赞清	( 153 )
治世能臣谭钧培	( 157 )
民主先驱李端棻	( 162 )
罗文彬与《香草园日记》	( 168 )
风骨稜稜的刘春霖	( 174 )
气壮山河捍国权的陈灿	( 179 )
直声震天下的陈田	( 183 )
以贵州为荣的陈夔龙	( 187 )
赵氏家族与青岩古镇	( 190 )
戊戌状元夏同龢	( 195 )
清末探花杨兆麟	( 198 )
名噪京华的艺术家姚华	( 203 )
陈国祥与梁启超	( 208 )
<b>贵州七百进士名录</b>	( 213 )
<b>附录:</b>	
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	陈福桐 ( 260 )
一门四进士 父子两翰林	陈德远 ( 265 )
<b>后记</b>	( 270 )

# 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



明清之际，贵州人才蜂起，以“万马如龙出贵州”之势，角逐于华夏的科举场上，创造了“七百进士六千举人”“三鼎甲（状元）一探花”的骄人成绩。可谓“俊杰之士，比于中州”。如今这些黔中才俊的大名仍镌刻在北京孔庙、国子监的碑柱上，常常吸引游人驻足谛视，勾起他们思古之幽情。

当人们惊异于贵州的这一文化现象时，不难从历史中得到答案：这是历史的际遇造就了贵州，是贵州日显重要的战略地位造就了这一文化现象。

## 建省兴学，作育人才

贵州在元代分属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个行省，没有独立的身份。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为扫荡云南元军的残余势力，朱元璋派傅友德统率三十万大军分兵两路远征云南。平滇之后，为巩固云南边防及稳定西南政局，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，便下令在通往“滇之喉”的地区屯兵二十万，沿驿道一线设立卫所，实行军事管制，并在今天的贵阳设立最高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。之后，明统治者基于统治的需要，于永乐十一年（公元1413年）在贵阳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，即省级行政机构；以蒋廷瓛为首任布政使，旋置按察司；以成务为按察使。这样，贵州终于配备了“行政、军事、司法”三司的省级统治机构。

贵州的“建省”，标志着明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的高度重视，亦标志着贵州新时代的到来。

朱元璋是一个颇有头脑，治国有术的君王，深谙教育的特殊功能，在其君临天下之后，便把教育作为基本国策，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。他曾说：“治国以教化为先，教化以学校为本”。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贵州，

他在加强政治、军事统治的同时，强调“移风善俗，礼为之本；敷训导民，教之为先”。要求驻黔官员的任务是“广教化，变土俗，使之同于中国”。

朱元璋之后的明代统治者，莫不遵循这一祖训，把施行教化，兴学育才作为既定国策，目的在于使人民“知君臣之道”，更好地驭民。在明朝历代派驻贵州的巡抚、按察使、提学副使，以及府、州、县、卫较低级的官员中，大多尽职尽责，以推动贵州教育为职志。他们设学官，建文庙，办书院，大力提倡儒学，以此“作养人才”。一些开明的土司也将自己的子弟送入国子监，以此因应时代的变化。正德年间，王阳明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谪居贵州龙场驿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著书立说，并创办龙岗书院，旋即受聘主讲于贵阳的文明书院。自此，在黔中开讲学之风，随之而来的是各地相继创办了二十余所书院。据史籍所记，从明初至崇祯三年（公元1630年），贵州共建官学四十七处，各府、州、县、卫、司“徧（遍）立学校，作养人才”，“人才日盛，科不乏人，近年被翰苑台谏之选者，往往文章气节与江南才俊齐驱。”

## 应试科场，名噪京华

明正统四年（公元1439年），贵州赤水卫（治今毕节县赤水河）人张谦中进士，成为明代贵州进士科名的第一人。之后，在明王朝统治的二百零四年间，黔中才俊纷纷冲出山路阻隔的家乡，到京华的科场上去检验自己的才华和实学。结果，这些来自“蛮陬之地”的士人们名噪京华，令人惊叹，赢得了一百零九名进士一千七百二十名举人的好成绩。正如贵州诗人陈田在《黔诗纪略》中所说的：“贵州自成祖开省迄于神宗，阅二百年，人才之兴，媲于上国……”在这些进士中，不少人成了政界、文坛的风云人物，成为统治者倚重的股肱之臣。如赤水卫的张谦，历官顺天府尹（治今北京市）、太仆卿、大学士；思南府的申祐，官四川道御史。明英宗北伐，代帝殉难于土木堡之役；贵州都司平越卫（治今福泉县）的黄敏，历官刑部郎中，陕西巡抚、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南京户部尚书；贵州卫（治今贵阳市）的徐节，官至山西巡抚，因反对宦官刘瑾而罢官，旋复职；贵州都司兴隆卫（治今黄平县重安区）的周瑛，官至广西布政使。他是贵州著名的教育家，弟子门生中不少考中进士、举人；平溪卫（治今玉屏县平溪镇）的侯位，历官都御史、浙江巡抚、兵部左侍郎，应天都御史；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（治今德江县）的田秋，官至广东布政使，疏请贵州开科（从云南分出乡试），修府城，关心乡梓教育；普定卫（治今安顺市）的潘瑞，官云南布政使；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的敖宗庆，官至云南巡抚，惠政甚多，扬名中外；普安卫（治今盘县）的蒋宗鲁，由刑部主事，历官至云南巡抚，因反对权臣严嵩告归；清

平卫(治今凯里市炉山镇)的李祐，官至广东巡抚。还有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的孙应鳌，他是首任国子监祭酒，一生著述甚丰，为海内外所瞩目；普定卫的梅惟和，官御史、广东巡抚，其人严毅刚正，有政声；铜仁长官司(治今铜仁县)的陈珊，子扬产，父子二人进士。扬产兄弟八人，或进士或举人，被孙应鳌誉为“八英”；平溪卫的唐一鹏，历御史、浙江巡抚、陕西巡抚、升太仆寺卿；贵州都司贵州卫(治今贵阳市)的马文卿，历御史、巡按广东，以刚直谪归；永宁卫(治今四川叙永县)的熊文灿，平闽海盗有功，升广东巡抚，官至兵部尚书，总理军务；安化县(治今德江县)的田仰，历太仆寺少卿，四川巡抚、四川总督，为官严介有政绩。因平定奢崇明有功，晋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；思南府朗溪长官司(治今印江县朗溪乡)的田景猷，因征抚水西安邦彦反叛而殉难，赠太仆寺卿；思南府安化县(治今德江县)的孙顺，永明王朝时官至兵部尚书；贵州平溪卫的张佐辰，官吏部尚书，东阁大学士……

在明代贵州的一百零九名进士中，具有军籍的32人，官籍35人，民籍28人，无籍15人。他们大多来自入黔的军人、官员及移民的后代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受儒家“幼而学之，壮而行之”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思想影响较深。现将明代贵州进士产生的地域统计如下：

贵州卫、贵州前卫、贵州宣抚司、贵筑长官司、新贵县(均治今贵阳市)：26人

铜仁府(治今铜仁县)：7人

思南府、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、思南府朗溪长官司、安化县(治今思南县、德江县、印江县朗溪乡)：12人

普安卫(治今盘县)：11人

普定卫(治今安顺市)：8人

永宁卫(治今四川叙永县)：7人

镇远府(治今镇远县)、镇远府偏桥卫(治今施秉县)：5人

清平卫(治今凯里市炉山镇)：6人

平溪卫(治今玉屏县平溪)：4人

新添卫(治今贵定县)：3人

石阡府、石阡长官司、石阡葛彭葛商长官司(均治今石阡县)：3人

都匀卫(治今都匀市)：3人

湖广都司五开卫、黎平府永从乡(辖今黎平县、从江县永从乡)：3人

乌撒卫(治今威宁县)：2人

平越卫(治今福泉县)：2人

赤水卫(治今毕节县赤水河)：4人

贵州都司兴隆卫(治今黄平县重安区)：1人

敷勇(治今修文县)：1人

### 麻哈州（治今麻江县）：1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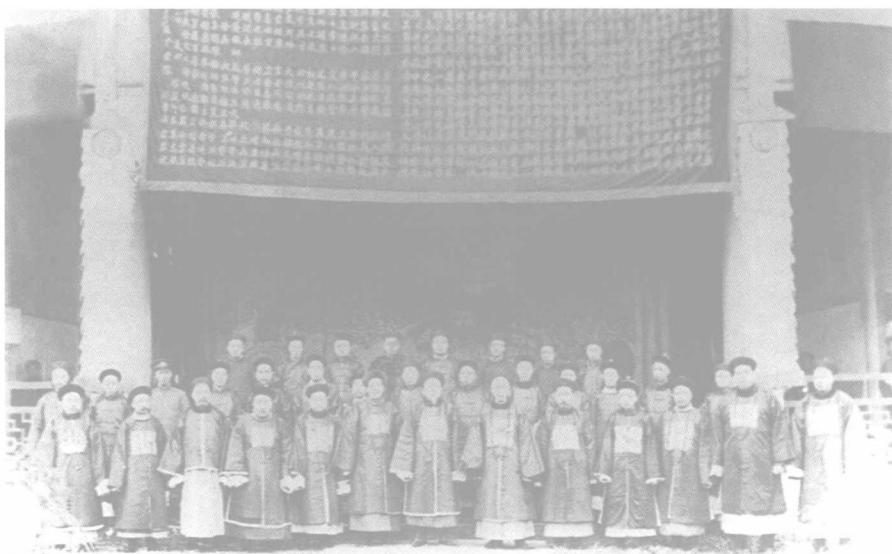
虽然此文着笔于明代贵州的进士，然而也不能忽视举人中的优秀人物。如誉满江南“诗书画三绝”、“崇祯八大家”之一的杨文骢，统辖南明王朝西南五省被誉为“南天一柱”的抗清名将何腾蛟，还有被孔尚任惊为“其人”“其诗”酷似屈原、杜甫的吴中蕃……

看到这里，读者可能会诧异地问道：“是否作者漏掉了遵义这个地方？”过去笔者也曾对这个历史现象感到费解，后经过反复深思，感到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遵义在唐代称为播州，被柳宗元称为“非人所居的地方。”唐乾符三年（公元876年）南诏攻陷播州，山西太原人杨端应募将兵平定播州之乱。平播后，朝廷便让他领播州，世居其地。杨氏家族统治播州达二十九代，形成了土司制度。虽然他们延请巴蜀学士来讲学，教授族中子弟，然而这种封闭的家塾教育无助于整个地区的文教普及和发展。宋代遵义时称播州，唐宋两代均由中央政府直接辖制。宋代遵义在文化上曾有过光辉的一页。嘉熙二年（公元1238年），遵义冉从周中进士，开了黔中进士之先。之后，遵义在宋代又出了七个进士。然而到了明万历二十四年（公元1596年）七月，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因子杨可栋被朝廷所杀一事，起兵反明，兵败自焚，从而结束了杨氏家族统治播州长达725年的历史，历史上的成绩和贡献也随之湮灭。元、明两代，遵义划入四川管辖，成了该省的边远地区。文教不兴，竟然没出一位进士，真令人匪夷所思。

## 改土归流，大兴官学

时代兴替，清朝肇造，由于统治者重视教化，因此贵州的教育仍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。康熙初年，贵州提督学政田雯疏请在永宁、独山、麻哈三州及贵筑、普定、平越、都匀、镇远、安化、龙泉（今凤冈）、铜仁、永从（今从江）九县建学育才。之后又陆续在各府、州、县、厅设立学校。至此，贵州所辖的十一府四十州县均设有官学。自康熙、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“改土归流”后，完全打破了过去土司、流官并治的局面，这样官学才得以深入到“王化未及”的苗疆。这是贵州第二次文化勃兴的政治因素；其次，清初为追击南明残余势力及平定三藩后，大批军人、官员及移民纷纷涌人贵州，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、湖湘文化、川蜀文化，带来了先进的耕织技术和经商方式。这些移民在各地兴建的两湖会馆、四川会馆、广东会馆、陕西会馆等，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这是其经济因素。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，那就是清政府派往贵州的巡抚、提督学政及知府中，不少人是饱学之士，如田雯、洪亮吉、阮元、张澍、林则徐、贺长龄、胡林翼、何绍基、严修、林绍年、赵尔巽等，他们不仅学识

渊博，而且致力于贵州的经济和文化。以洪亮吉为例，其人系乾隆年间著名的诗人、史地学家和散文家。在担任贵州学政时，为振兴贵州的教育，洪亮吉走遍了黔中的山山水水，视察了各地的教育状况。乾隆六十年（公元1795年），贵州乙卯科乡试揭晓，洪亮吉获悉贵阳贵山书院生徒中举二十七人的消息后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即兴赋五百字长诗以贺。其中有这么四句，可见其对贵州人才勃兴的喜悦及期望。前二句是：“贵山储人才，两岁隽及册。”意即贵山书院甲乙两科生徒中举四十人。另外两句是：“谁云鬼方恶，直欲胜宣歙。”其意是，贵州的人才兴起，将会赶



超安徽的文化名城宣州（以产宣纸闻名）、歙州（今徽州，以产墨闻名）。

由于中央政府在全国大兴官学的政策推动下，贵州的各级官吏大多克尽职守去完成这项工作，兼之自康乾盛世后贵州各地的经济日益发展，书院、义学、私塾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。据民国《贵州通志·书院表》所载，清代贵州共有一百四十所书院，较之宋代的一所和明代的二十一所，简直是天渊之别，无法比拟。著名的书院有：贵阳的贵山书院、正习书院、正本书院，遵义的湘川书院，安顺的维凤书院，都匀的南皋书院，镇远的灔阳书院，福泉的墨香书院等。它们对贵州的教育起飞贡献甚大。康熙二十一年（公元1682年），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兴办义学。贵州“改土归流”后，义学大多办在少数民族地区，使之习俗“同于中国”。据民国《贵州通志·义学表》所载，贵州各府、州、县共有义学301所。另外，贵州民间办有大量私塾，对启蒙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## 万马如龙，华夏瞩目

“君看缥缈綦江路，万马如龙出贵州”。这是清代四川翰林赵尧生在《南望》诗中评价贵州大诗人郑珍的《巢经巢诗集》的两句诗。赵尧生以“万马如龙出贵州”来比喻黔中才俊气势恢宏地冲出故乡，到华夏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求发展。正如赵尧生所言的，清代贵州中进士六百二十一人，中举者六千余人，而且出了“三鼎甲一探花”，和四川、云南两省仅出了一名状元相比，对于一个被世人视为“蛮夷之邦”的贵州来说，不仅值得骄傲，而且令华夏士人为之叹服。

清代贵州的进士不乏优秀人物，而且才华横溢，头角峥嵘，如福泉的王士俊，经康、雍、乾三朝，历湖北、河南、四川三省巡抚，为官清正，体恤民困，敢于革除苛敛钱粮，又敢“越权言事”。终因违逆上命，部议“照大不敬拟斩立决”，后遇赦回籍。又如织金的丁宝桢，一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，诛杀宦逆，整顿吏治，兴修水利，兴办洋务，是一个“清绝一世”的“中兴名臣”。再如贵阳的李端棻，他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倡导者，戊戌变法的坚定支持者；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宪政改革，是贵州的民主先驱。

许多士人虽然没能进入进士之列，却在不同的领域大展光华，彪炳千秋。如沙滩文化的郑珍、莫友芝和黎庶昌，前二者系举人，后者仅廪生，然而他们在诗歌、散文、汉学和方志学上的成就，却是海内称誉，人所钦仰的。





清代贵州的人才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，并以家族，亲缘和师承关系的文人群体为主导，其原因是，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，读书人以苦读求仕为生存法则，以金榜题名，扬名显亲为人生的最高理想，世代追求，乐此不疲。查阅和研究了贵州的一些名门世家的资料，笔者发现不少人家人才辈出，屡登科名，现将不完全的统计抄录如下：

自清以来，贵阳书香仕宦人家人才崛起，群星闪烁，在科举场上大领风骚：

顺治康熙年间，徐必远、徐必遴昆仲，王承祥、王承祜兄弟联袂而起，荣膺进士，为贵阳世家子弟作出了榜样。

道光同治年间，车汝震、车汝建弟兄及寇嘉相、寇本诚昆仲相继而起，荣登进士榜。

黄家一门四进士：黄辅相、黄辅辰兄弟道光进士，黄辅辰为官刚正严明，不畏权贵，时人誉为“硬黄”。辅辰之子黄彭年，亦道光进士，为官清正，博学多才，曾被川督骆秉章、直隶总督李鸿章、陕西巡抚刘蓉、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所倚重。彭年长于史志，精于舆地，有“通志巨擘”之誉。彭年之子国瑾，光绪二年进士，人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后任编修。

李家四进士：李朝仪，系李端棻的叔父，亦是梁启超的岳丈。道光进士，官至顺天府尹。李端棻同治二年进士，其弟端矩、端棻系光绪进士。李端棻是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，一生忧国忧民，关心教育，曾疏请建立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前身），并向光绪帝上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对中国的维新运动及新式教育的创建贡献甚大。其官至礼部尚书。

何家“五代七翰林”、“一榜三进士”：何家清初来自安徽，后一房移居开州（开阳）。雍正八年，何锦中进士，任翰林院检讨。后其家五代人中进士入翰林院者六人：何德新、何德峻、何泌、何学林、何应杰、何亮清

(字湘雪)。咸丰十年(公元1860年)，何亮清、何鼎、何庆恩三人考中进士。是年贵州中进士仅五人，而何家占了三人，故有“一榜三进士”之美谈。李端棻的母亲来自何家。端棻早孤，承舅父何亮清及叔父李朝仪悉心教导，终成大器。

**陈灿、陈田家：**陈灿、陈田、陈馨兄弟系光绪进士。陈灿官至甘肃布政使。光绪二十年(公元1894年)，陈灿曾两次为勘界大臣，代表中国政府与英政府勘定滇缅边界，坚请朝廷拒绝英方无理的划界要求，维护了国家主权；其弟陈田，为官持正不阿，任御史时曾弹劾庆亲王奕劻揽权纳贿，鬻爵误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权倾一时，飞扬跋扈。后引退，潜心著述，其编著有《明诗纪事》、《黔诗纪略后编》、《周渔璜年谱》等。

**陈夔麟、陈夔龙家：**陈氏兄弟系光绪进士，兄夔麟官至广东布政使，弟夔龙，系丁宝桢的侄女婿。其由兵部主事历顺天府尹、漕运总督、河南巡抚、江苏巡抚、湖广总督及直隶总督，是晚清贵州大老。

**花家**也大有名气。父花杰，嘉庆进士，子宴春、咏春、道光进士。花杰平生清廉刚直，疾恶如仇，敢于揭发皇帝的亲信大臣的恶行，有“殿上虎”、“花老虎”之称。

**周家人才济济：**嘉庆、道光年间出了七个进士。他们是周际华、际钊、际铨、际云兄弟，以及际华之子周项、周颙、周灏。另一个周家在科举场上也大有斩获：父周涛，嘉庆进士，侄周鹤、周麟、咸丰进士。

**傅家**也是书香仕宦人家。嘉庆年间，傅潢中进士；咸丰年间，其子傅寿彤又中进士。

贵阳城郊的青岩古镇，是卧虎藏龙之地。康熙年间青岩骑龙出了一个周起渭(字渔璜)的进士。其才华横溢，名噪京华，被时人视为“力持风雅，领导群彦”的文坛领袖。周起渭人生的闪光点莫过于编纂《康熙字典》，为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。镇上的团总赵国澍是咸丰十一年(公元1861年)青岩教案引起中法外交冲突的关键人物。其子三人中进士、一人中经魁，其中赵以炯系光绪十二年(公元1886年)丙戌科状元，亦即贵州历史上第一位文状元。

开阳也是家族文化领风骚的地方，除前面提到贵阳何家的开阳另一支外，道光年间，萧家的萧时馥、萧时春兄弟先后中进士；光绪年间，胡嗣芬、胡嗣瑗昆仲又中进士。

长顺县(广顺州)出的进士大多来自名门望族，具有浓重的家族特征。嘉庆、道光年间，金鼎寿、鼎梅、鼎铭、鼎年兄弟四人相继荣登进士榜，著名的但家也出了两名进士；嘉庆年间，但明伦中进士，历官翰林院编修，至两淮盐运使，有诗名，著有《广顺州志》。其子但钟良，道光年间进士，亦是翰林，为太平军所杀，清廷赠太常寺少卿；光绪年间，赵湘洲、赵家惠先后中进士，为长顺的书香人家增光添彩。